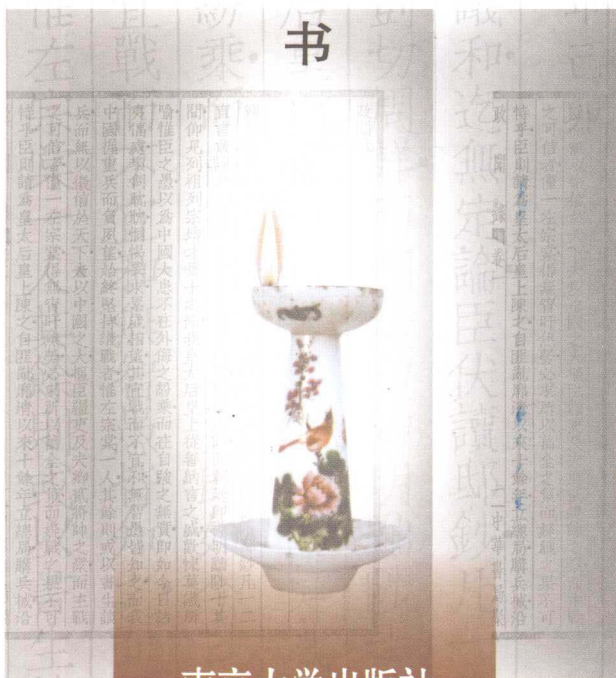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卫春回 著

张謇评传 (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謇评传/卫春回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6021-2

I. 张… II. 卫… III. 张謇(1853~1926)-评传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6193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张謇评传

卫春回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31 字数 336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021-2

定价:60.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任天石 巩本栋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思想篇

第一章 追求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观念

近代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此过程中,张謇秉承中国传统士人的若干精神潜质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变革弊政以求自强成为他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而言,张謇已在制度层面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政体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他投身立宪和拥护共和的思想基础。然而其心灵深处却对支撑现代民主体制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无法真正接受,他激烈地抵制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也自在情理之中。从根本上说,张謇接纳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前提是不可动摇的儒学根基,他晚年不遗余力地鼓吹和弘扬处于四面楚歌中的儒学,乃至以佛辅儒,均是出于对传统儒学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结。纵观张謇一生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足可深刻体会到政治追求与文

化背景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一特殊的环境下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这一过程的发生首先起因于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其实,早在 17 世纪中期,西方人便开始寻求和中国人沟通的渠道,在百余年的时间中,西方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数十次,然而结果无不令其失望而归。当时的中国完全陶醉在数千年的“四夷宾服”和“万国来朝”的梦幻中,毫不理会已经迫近的时代浪潮。封闭的心态、紧锁的大门使中国处于愈来愈尴尬的境地,直到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才使沉睡中的“天朝上国”有所触动,随后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令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严重的局势迫使中国不得不追赶和迎合世界潮流。

如果说外来侵略是引发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因,那么中国社会中某些固有因素在新形势下的变通和发展也未可低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形成的若干精神潜质和思维方式已溶铸于国民特性之中,作为传统文化主要传承者的士人群体则更突出地体现和负载着这些文化潜质。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忧患意识在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所得到的激化和高昂。

忧患意识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早在先秦文献中便有十分突出的体现,“六经”之首的《易经》以及《尚书》中的不少篇章均充满忧患思考。“其入出以度,内外使



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①中国古代士人无不从中吸取养分,从而形成绵延无限的忧患情怀。应该说,忧患意识体现的是,对待社会人生一种戒惧和沉毅的精神状态,其间蕴含着深厚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即无论个人的境遇如何,或穷或达、或微或显、在野在朝、为民为官,其忧国忧民之思不可绝。

古代士人的忧国忧民之情被近代知识群体必然地继承发扬,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改良主义思想家,从维新志士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其忧患之深,无以言述。张謇作为近代士人群体中的先进人士,同样忧患切切。早年的游幕生涯已使张謇对朝政国运深为担忧,他在一份奏疏中指出:“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即如今日诸夷逼处,环伺耽耽,恫喝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而不宜和,无智愚皆知之。”^②而让他深感痛心的是洋务派虽“立总局,购兵械,沿江海设防,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耗于无用”^③。尤其是甲午战争,新科及第的张謇虽与帝党人士积极主战,但终于不能阻止主和势力,结果清政府败于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并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使张謇的忧愤之情达到惶悚痛愤、寝食难安的程度:“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及今日力图补救,应以夜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

① 《周易·系辞下传》。

② 《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全集》第一卷,第1页。

③ 《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全集》第一卷,第1页。



局,何堪设想?”^①

深切的忧患必然产生变革弊政以求自强的强烈愿望。而求新求变不仅是时势所需,也是传统文化蕴含的又一精神要素。先秦著作《周易》便充满了变化发展观念,它认为宇宙、社会、人生是变化不息,生生不已的过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②“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③“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④近代以来许多主张变革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援引《周易》,洋务派以此来证明变易的必要与合理,王韬、郑观应以“穷变通久”为其立论,严复则以“演进”释“易”,将中国固有的变易观念发展成现代意义的进化观,康有为更指出“变者天道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并以公羊三世说附会进化论。张謇对《周易》的钟情也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他便潜心于《易经》训诂,整理出《周易音训句读》卷上、下,这是他平生唯一系统的学术研究专著。张謇深受《周易》所揭示的变化观影响,他早期宣传变法的代表作《变法平议》便有充分体现:“夫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日月星辰,曜明而无常度;布帛菽粟,饱暖而无常品。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⑤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社会是在不断变化中发展前行,所以变化是必然的。直到晚年,张謇还经常自称一生得力于《易》者颇

① 《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全集》第一卷,第29页。

② 《周易·系辞上传》。

③ 《周易·系辞上传》。

④ 《周易·系辞下传》。

⑤ 《变法平议》,《全集》第一卷,第76页。



多：“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备于《易》。”^①

需要指出，《易经》所强调的变化观实际上是“变易”与“不易”的结合，即事物的发展规则是从弱到强，逐步递升，如果超过了它最适宜的发展阶段，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因此把握和谐的度十分重要，这里所体现的中庸守常的“中和”观念正是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庸》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②这里无所偏倚的“中”是天下之大本，发而中节的“和”，是天下之达道。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③即无过无不及的状态是一种最佳的价值追求境界。“中和”的另一个含义是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与和谐统一，孔子主张“和为贵”^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⑤。《中庸》认为自然界是一个“万物并育”互不相害的和谐整体，社会也当以协调配合为重要原则。致中和的思维方式在后世中国影响颇大，它成为儒士们修身、治家、治国的根本价值标准。

张謇无可例外地深信中庸学说，相关的言论极多，如“夫圣人之道，则中焉耳。贤者过之，而不肖者不及。圣人不能必世无过无不及之人，而必不能因有过不及而易中之道。中即事以为权，非执一以驭事。世即变而道无时而不存，即中无时

① 《易经遵朱序》，《全集》第五卷（上），第267页。

② 《中庸》第一章。

③ 《中庸》第十章。

④ 《论语·学而》。

⑤ 《论语·子路》。



而不在也。”^①“任何一家之学说,主张稍过,不折于中,未有不流于偏宕者。”^②还说:“天下事贵得其中,若趋于极端,往往不能成事,即幸而能成,亦不过一瞬而已。”^③“世变未知所届,唯守正而处中者,可以不随不激。此种道理,《易经》最富”。^④很明显,张謇的变化观充满了“贵得其中”的中庸原则,即社会变革当恪守应有的分寸和尺度,否则便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统一,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即便是属于度范围内的变革,也应力求缓进和平稳:“则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⑤正像张孝若所言,张謇希望的是“严和中正”的变革,而不是激进的社会革命。

无论对变革程度有何种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坚定了张謇变革弊政、以求自新的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意识在和西方文化交汇碰撞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全新的扩展。具体说,首先,张謇认识到,强国富民绝不可局限于男耕女织的传统田园生活,而应该“察世变”、“征之事”,随世而异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工业文明。“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⑥从现代意义的实业概念中,张謇引伸出“棉铁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还呼吁中国社会的精英们需把目光投向实业,“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

① 《沙健庵六十生日序》,《全集》第五卷(上),第351~352页。

② 《释惑》,《全集》第五卷(上),第193页。

③ 《暑期讲习会第二次演说》,《全集》第四卷,第215页。

④ 《家书》,《全集》第四卷,第642页。

⑤ 《变法平议》,《全集》第一卷,第48页。

⑥ 《劝通州商业合营储蓄兼普通商业银行说帖》,《全集》第三卷,第761页。



先之”。^①接受新式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另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危亡”,因为“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②他进而认为实业和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便是著名的“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

其次,张謇真诚地鼓吹和拥护“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作为立宪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深刻认识到:“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③因此一定要变更政体,“朝廷变法自强,屡下明诏,凡百新政,未尝不渐次设施。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④武昌起义发生后,张謇又再次追随时代潮流,公开拥护和支持民主共和,为辛亥革命终成定局立下功劳。这表明在张謇心目中传统忧患意识强调的君主社稷,已被国家民族的兴亡所超越。

再次,张謇将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改造方案——南通道路。在南通自治进程中,张謇力求实现以实业求经济富足,以教育提高民众素质,以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缓解社会矛盾,以文化礼乐移风易俗的全方位社会建设。这一系列“新世界雏形”的实践使南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时代新风貌,其中凝聚了张謇无比深厚的爱国救民之情。

① 《年谱》,《全集》第六卷,第864页。

② 《变法平议》,《全集》第一卷,第61页。

③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三,第18页。

④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167页。



最后,应该说明张謇的眼界和胸襟已颇具全球观念和世界意识,这大大超越了古代士人“华夷之辨”的封闭式思维局限。在对待中外关系上,张謇既坚持国家主权的立场,又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世界潮流的到来,他对经济领域的交流融合最具敏感:“而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①因此建立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国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济调控的若干手段、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等等都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应配套的观点显然也是世界目光的产物。

总体而言,张謇禀承传统士大夫的若干精神潜质,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中获得创造性的发展,以上论述足以表明张謇已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者。可以说,张謇一生开拓性事业的内核支柱正是源自于上述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由此产生的变法自强信念。

二、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

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政治理想,突出地表现在张謇对君主立宪政体的竭力倡导和对民主共和体制的真诚拥护。生平篇中我们主要以时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运动的发展进程为线索阐述和分析了张謇的思想演变和政治行为。此处则更多地着眼于张謇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政体形式的理解来进一步探究其政治思想的渊源流变。大致来说,张謇对政体

^① 《致商会联合会函》,《全集》第一卷,第291页。



改革的认识与理解经历了体制内的温和改革、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三个时期。

（一）《变法平议》中温和的政体改革要求

生平篇已述及，在清政府“新政”的号召下，张謇很快赶写了2万余字的《变法平议》，全面叙述了他的改革方案，虽绝大部分集中于“变事”的范畴，但其中“设议院”、“设府县议会”两项内容已温和地涉及到有关政体改革的问题。

按照张謇的说法，议院是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集议院、元老院的作法：“凡制定新法、改正旧章、上有所建、交院议行；下有所陈、由院议达。故下无不通之情，上无不行之法。”^①根据中国的情况，议院应由京外四五大臣作领导人，由他们自行选举议员构成。其任务是“采辑古今中外政治法之切于济变者，厘定章程，分别付行法、司法之官次第举行，随时斟酌损益，不必专事督促，覆蹈操切之辙。”^②这种议院和西方政体中的议院相去甚远，首先议员并非民选而是由几位官员指定产生；其次厘定的章程虽然要付行政、司法部门次第举行，但是却不必专门加以监督，换言之，议院对上述两部门并无约束力。因此，议院实际上是一个上传下达的咨询机构，还远不具备三权分立中独立立法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设府县议会”也是以日本的府县议会作为样板。国家的

① 《变法平议》，《全集》第一卷，第49页。

② 《变法平议》，《全集》第一卷，第49页。



各项兴革措施要让百姓接受“权衡枢纽,必在议会”^①。具体说府县议会以地方大小定议员多少,最多不超过5人,选举和被选举者都必须是有家资或有品望的人,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当地的士绅。每两年要有一半的名额改选,常会三个月开一次,有事可召集临时议会。“议事草案,由知事令交付其所议之事会决之。其府县事以地方税支办者,预算之数额,征收之方法、会定之。可否视同议者多寡,可数多者;数同则决于长。”^②比之于议政院,地方议会的议决权力有所增加,不过,民众参予的程度仍极有限,仅有的5位议员均是地方士绅,和真正的地方议会政治非可同日而语。

其实,这两项内容早期改良主义者和维新派都已提出过,张謇并没有超乎其右的新见解。但就张謇个人而言,这是他首次涉及到政体改革问题,虽仍是体制内幅度不大的修改补充,但可从中初见立宪意识的端倪。

(二) 君主立宪思想

70天东游日本的所见所闻,和由日俄战争引发的深刻反思,使张謇的立宪思想渐趋成熟。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辛亥(1911年)年间,他积极投身全国性的立宪运动,并成为立宪运动的著名首领。这期间他写成的奏稿、书序、请愿书及信函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立宪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下分几个方面予以分析讨论。

① 《变法平议》,《全集》第一卷,第53页。

② 《变法平议》,《全集》第一卷,第53页。



第一,效仿以民众参与为基础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就世界范围看,君主立宪政体有两种范本——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20世纪初年,仿行立宪几乎成为社会先进人士的普遍共识,那么采用何种立宪模式更为合适成为包括张謇在内的立宪派首先遇到的问题。为了使论述更加清楚明了,我们有必要对两种模式作一简单介绍。从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世界各国情况看,以英国为代表的“协定立宪政体”和以德日为代表的“钦定立宪政体”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英国的立宪政体是英国社会内部新兴的布尔乔亚和市民阶级与国君为代表的旧贵族之间势力均衡所形成的历史结果。双方通过宪法的政治契约,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典型的立宪政治,具体表现为“分权政治”,即通过地方自治、自主性的市民社会与议会来限制君权,并制约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因此立宪政府乃是“有限政府。”

明治维新的日本与1918年以前的德国则属于另一种“非典型的立宪政体”。在这种体制下,立宪作为一种现代形式的政治符号并不具有真正限制君权的实质意义,换言之,立宪政治的形式并不妨碍权力的集中运作。就日本的情形看,明治政府是在结束了长期幕府割据分裂状况后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在推行君主立宪的过程中皇权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根据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颁布的宪法,天皇享有立法、司法裁决、军队统帅、议会的召集与解散、法令的颁布、官员任免等巨大的权限,正如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指出:“天皇制把近代立宪主义嫁接在源自古代世界的神权的、家长式的观念上了。然而这种立宪主义是形式上具有‘束缚议会权力’的伪装的立宪主义。伊藤博文的‘立宪君治’是用立宪主义来



伪装神权的家长式本质。”^①这种“钦定立宪”政体是在日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于日本和德国两个相对落后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而言,它恰恰起到了加强国家权威,并运用其威慑力量调集各种资源以推进现代化的作用。日本人甚至感到“能够有明治天皇这样一位杰出的君主,对日本来说,这是比什么都幸运的事”^②。

新政时期的中国立宪派是怎样选择理想的立宪模式呢?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一是主张效仿日德模式,清政府及其权势派官僚大多倾向于此,无论是从既得利益,还是从日本立宪中所获得的经验,这一主张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日本宪法,其宏纲要旨,无非上保皇室之尊荣,下予人民以幸福,施之我国,至为合宜。”^③按照日本钦定立宪蓝图,实现所谓开明专制政体,即立宪后的内阁、议会在法律上仍从属于君主,并尽可能地抑制社会各阶层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二是效法英国模式,即宪法出于君主与议会的协议,则立宪权由君主与议会共有,议会有相当权力以节制君权的滥用。这一派人以梁启超、杨度、熊范舆等在野绅士为代表。他们主张扩大民众自下而上的参政权利与地方自治,只有充分调动民权、才能团结人心,改变“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④的弊政,促使君民“同德一心,合力御外”^⑤。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23页。

②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4页。

③ 故宫博物院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75页。

④ 故宫博物院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10页。

⑤ 故宫博物院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16页。

